

·  
发现  
问题  
篇  
·





1

| 第 1 章 |

# 日本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

国民对老年生活和未来感到不安

面对史无前例的“低欲望社会”，  
20 世纪的经济政策已不再适用

## 安倍经济学的“六支箭”全部脱靶

2016年12月5日，安倍首相的在任天数累计达到1807天（含2006～2007年首次执政），超越中曾根康弘升至“二战”后历任首相的第四位。

现行自民党党则规定，总裁任期最多“两届6年”，但2016年11月，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会已批准将总裁任期延长为“三届9年”。所以，到2017年5月末，安倍首相的在任天数将超过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1980天，成为日本“二战”后任期第三长的首相。

如果安倍能在下一届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再次当选，那么其在任天数将超过佐藤荣作的2798天，很有可能升至“二战”后任期第一长的首相。

包括战前时期在内，历代任期最长的是明治时期的桂太郎

首相，在任天数 2886 天。安倍若能够任满三届 9 年，那么他也将刷新战前纪录，成为历代任期最长的首相。

仅从在任天数来看，安倍晋三好像能称得上是平成时代的名首相。但是其政策本身怎么样呢？他真的做了名首相该做的事了吗？

有一句话叫作“一届内阁一件事”。例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其任职期间，解决了“国有铁路民营化”这一历史遗留的大问题。然而，安倍首相如何呢？至少在现阶段，他作为首相，业绩里面没有一项是值得肯定的。

大约是在他刚上任的时候，安倍推动《国民投票法》顺利通过，开启了他的修宪之路。但是，由于国民对自民党的宪法草案并不支持，所以如此重要的修宪讨论一直被束之高阁。

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经济政策。安倍首相在上任之初为了重振日本经济，提出了三大政策，即“三支箭”，分别是“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战略”。紧接着为了迈向“一亿总活跃社

会”，安倍首相又提出了“新三支箭”——“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安心的社会保障”。虽说气势上很强大，但在重振日本经济这一问题上，可以说这几支箭一支都没命中。

也就是说，安倍经济学的“六支箭”全部脱靶。虽然如此，但安倍首相直到现在依然想推行他的安倍经济学。

然而，当初因为害怕受到安倍首相攻击的大众媒体也开始发表一些批判性文章。例如，《日本经济新闻》在 2016 年 12 月 23 日刊登的《缺乏结构性改革的预算案，安倍经济学已露出破绽》一文，直批安倍经济学。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已经从根源上开始瓦解了。

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后不久，日经指数确实曾急速上涨。那是因为国民看到政权由民主党转向自民党，期待着政府推出一些有效的经济政策，股价才暂时性上涨而已，并非是安倍经济学的效果。

## “异次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惨淡

安倍首相若真想重振日本经济，就应该痛快地承认安倍经济学已经失败，认真反省。

2012 年 12 月，第二次安倍内阁正式成立，安倍首相推出

了其经济政策的支柱，即“安倍经济学三支箭”。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支箭的效果（关于安倍经济学的失误，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已经了解这一部分的读者可以略过）。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支箭——由安倍与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共同提出的“大胆的金融政策”。

为了摆脱通货紧缩，黑田东彦提出“两年内实现 2% 的通胀目标”。随后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央行开始疯狂地从金融机构购入国债，为市场提供资金，甚至在 2016 年 1 月宣布实行“负利率”。日本央行为达成 2% 的通胀目标，甚至不惜采用这种危险的做法，但是效果却很惨淡。

当初黑田东彦宣称将在就任的两年后，也就是 2015 财年内实现 2% 的通胀目标，但不知不觉中日本央行将实现 2% 通胀目标的时间推迟至 2016 财年上半年，之后又推迟至 2016 财年下半年、2017 财年上半年、2017 财年内……可能黑田东彦也知道按计划实现不了，此次又把 2% 通胀目标的实现时间推迟至 2018 财年前后。

但是，黑田东彦的任期将在 2018 年 4 月结

束。作为共同推出大胆的金融政策的“安倍黑田”组合中的一员，黑田东彦最终会因无法在任期内完成目标而举白旗。

另一方面，日本央行买入的国债总额高达 400 万亿日元，约占日本 GDP 的八成。一旦日本国债暴跌，大量持有国债的日本央行才是最危险的。可以说，日本央行已经驶入危险水域。而且，对于这一大胆的金融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斥责日本是汇率操纵国。

那么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其成效又如何呢？同样没有任何成效，只是增加了公共事业而已。由于日本政府扩大国债发行从而导致国家财政恶化，而且由于公共事业项目增加，引发了劳动力不足以及建筑材料费高涨等一系列问题。

我的一位友人是建筑公司的社长，据他说，自从安倍执政后，劳动力成本和建筑材料费等前所未有地上涨，所以这一部分的预算自然也就增多了，然而这些高额预算却顺利通过了。像公共事业领域，一旦接手了项目，无论预算超标多少，委托人都得开工。综上所述，所谓“灵活的财政政策”也不过是徒有其名，而事实上只是缓慢推进的财政支出项目。

第三支箭——“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战略”，也是没有任何显著成效。

2015 年，日本政府通过了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旨在发



展经济，实现财政健全化，具体政策为以下几项：

- 对地方机场进行调整，对于提前预约的公务机，允许其短暂停留；
- 为外国留学生提供在日就职帮助；
- 推进农业的“六次产业化”；
- 通过扩大访日外国人在日本购物时的消费税免税制度，振兴日本的旅游购物业；
- 通过发展 IT 行业及机器人产业，推动产业结构改革。

可以看出，以上几项政策都是一些想让各省各厅都受益的抽象政策，这之中没有一项能够称得上是成功的政策。此外，从一开始就被安倍首相当作核心政策的“地方创生”和“扩大女性劳动力就业”这两项政策，也都只是徒有虚名，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贡献。

## 不能再继续推行错误的政策

2015 年 10 月，安倍首相进行了内阁改组，同时安倍经济学也步入第二阶段，安倍首相又提出

了“新三支箭”——“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安心的社会保障”。让我们看看“新三支箭”的具体情况。

第一支箭的目标——到 2020 财年名义 GDP 提升至 600 万亿日元；第二支箭的目标——2025 年前后实现希望出生率，即合计特殊出生率达到 1.8；第三支箭的目标——到 21 世纪 20 年代初“实现护理人员零离职”的目标。这一次安倍倒是提出了具体的数值目标，但是每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都很小。

首先，第一支箭——到 2020 年名义 GDP 提升至 600 万亿日元。如果每年的名义 GDP 增长率达到 3% 的话，这一目标或许还有可能实现，但实际上日本的名义 GDP 增长率仅为 1% 左右，可见，几乎没有可能在 5 年内实现这一目标。想必安倍政权也十分清楚这一情况，所以日本政府公布 2016 年 7～9 月的潜在增长率时，宣布将采用新的 GDP 计算方法。说白了，这就是一种为了达成目标数值而修改计算方法的作弊行为。

其次，若是日本真想实现 1.8 的希望出生率，就应该像法国那样，实施优厚的育儿鼓励政策。但这需要政府拿出 GDP 的 3% 来支持，然而安倍的计划里根本没有此项考虑。

同样，要想实现护理人员零离职的目标，接下来就必须大量建设养老设施。然而，到那时又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和工作人

员呢？

由此可见，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全都进展不顺，没有取得显著成效。

虽然如此，安倍首相仍在 2016 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大喊口号“朝着这条路继续奋力前进”，慷慨激昂地宣称要继续推行安倍经济学，以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

然而，在日本政府或是自民党党内人士中，没有一位阁僚或是政治家能够站出来当面告诉安倍，若继续推行错误的政策，日本经济是不会好转的。

安倍首相虽然不擅长搞经济，但在设计宣传口号方面却很擅长，比如安倍的“继续奋力前进！”这句口号。即使这句话毫无实质性内容，但仅凭这一语感，大多数的日本国民就会很自然地认为“对啊，确实如此”。尤其在选举的时候抛出这句话，国民就会觉得“除了继续前进，好像确实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大家就会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前进。而当在野党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安倍政权只能反击“住嘴”“又要回到原点了”。不

得不说，这种做法是很难得到国民支持的。

看似拥有“男子汉气概”的国家领导人指明一个方向，国民只要朝着那个方向行动就行。这种现象已成为如今的世界趋势，从菲律宾和美国就能看出这一点。而且，本来日本国民就有一种特性，那就是一旦形成了一种“要沿着这个方向走”的氛围，那些原本不那么认为的人也会不明缘由地转为赞成。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就是如此。当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出这是错误的决定，应立刻停止这种行为，所以日本才不断膨胀，继而引发“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然而战争结束后，却有人站出来说，“那次战争就是鲁莽的行为，我们已经想到自己会输了”。这就是日本国民的特性。

因此，对于安倍经济学，本来媒体应该大胆指出“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日本经济是无法好转的”，但或许是因为害怕被安倍首相盯上，直到现在也没有一家媒体敢站出来指出这一错误，真是丢人。

## 日元贬值导致日本经济无法好转

之所以安倍经济学的所有政策都没有显著成效，是因为日

本政府对现实有着错误的认识。

例如，安倍首相说，“通过实施安倍经济学来推动日元贬值，那么那些迁至境外的制造业就会迁回日本”。显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即使这些制造业迁回日本，在日本也早已没有在工厂工作的工人了。

日本拥有大量劳动力的时期是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高度增长的时期，距现在也有 40 多年了。确实，在那个年代，由于从地方中学毕业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大城市求职，所以只要是首都圈的工厂，劳动力都很充足。但一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地方的初中毕业生集体涌向东京就业的景象渐渐成为过去式，位于城市周边的制造业为了招到工人，开始向东北等地的农村地区迁移。

现在，由于日本的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再加上大学升学率的提高，如今即使在地方也很少有初中毕业的工人了，而那些到了二二三岁还连一根铅笔都没削过的大学毕业生，并不适合工厂的生产工作。如今的大学毕业生都是趋于充分就业的状态，所以谁也不想专门去工厂工作。

因此，劳动密集型工厂只有设在泰国、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才能确保充足的劳动力。当然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日本，蓝领阶层不足是所有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日本想招募成百上千的工厂工人的话，就只能像德国那样依靠外来移民了。

我曾经参观过位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轮胎工厂，在那里，除了厂长，剩下的工人几乎都是外来移民。德国的失业率只有 4%（欧洲标准：欧盟统计局），失业率能够如此之低也是必然的。

所以，日本要想拥有充足的劳动力，政府就必须接受移民，引进 100 万人左右的外国劳动者。但是，安倍政权却不接受移民，这样下去肯定无法实现拥有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工厂劳动力。

同样，日元贬值有利于企业出口也是谎言。长期以来，美国不停地发起贸易战且诱使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尝尽苦头。基于这样的经验，为了尽可能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如今日本几乎所有的出口型企业都将生产地、经营地设在日元、美元以及东南亚等多种货币的国家，那里采取对汇率变动持中立状态的“中性货币政策”。

无论是 1 美元兑换 70 日元还是 120 日元，这些企业都能幸

存下来，而那些主张“日元必须要贬值”的企业早就破产了。或许有人会说：“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不是鼓励日元贬值吗？”然而，那群人是因日元升值而饱受痛苦的一个老年人群体。

同样，被安倍首相当作经济支柱的“国土强韧化规划”“灾后重建”“建设磁悬浮中央新干线”等政策，也没有什么大的效果，只是给承包工程的土木建筑业带来了一些微薄利润而已。由于日本是一个成熟的发达国家，所以通过增加公共事业建设带来的经济效果一定是微乎其微的。

对于建设磁悬浮中央新干线这项政策，由于日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简称“JR 东海”）称要用自己的资金来修建，所以这项政策并没有引起国民的争论。若这条新干线开通，从东京（品川）到名古屋只需要 40 分钟，但区间内 90% 的地段均需建设隧道。JR 东海应该对这项工程重新做一个基本评估，估算线路开通后一定会乘坐的人能有多少，算上公司要缴纳的税款，这项工程是否能产生利润。

同样，国土强韧化规划也毫无意义。即使政府整修了高速公路，通车数量还是一样的，所以

国土强韧化规划并不能算是经济政策。而灾后重建也是不得不做的事，并不是一项有乘数效应<sup>①</sup>的财政支出项目。

由此可见，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多么肤浅。若日本政府继续推行错误的政策，日本经济绝对不可能好转。

## 美国属于高欲望社会，其经济政策在低欲望社会的日本是行不通的

在安倍首相的经济智囊团成员里有内阁官房参事、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滨田宏一，明治学院大学客座教授本田悦朗（2016年6月辞去内阁官房参事职务，现任日本驻瑞士大使）等人。安倍首相拥有如此强大的智囊团，为什么就不明白美国的经济政策并不适用于日本这一道理呢。

其实问题出在智囊团身上。这些智囊团成员都是将美国经济学引入日本的先行者，他们直到现在还坚信自己年轻时在美

---

① 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是一种宏观的经济效应，也是一种宏观经济控制手段，是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其类型主要有三种：财政支出乘数效应、税收乘数效应和平衡预算乘数效应。乘数效应包括正反两个方面：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扩大、税收减少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扩大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扩张效应（上文中涉及的是这一方面）；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削减、税收增加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收缩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译者注



国所学的金融政策、财政刺激政策等 20 世纪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完全适用于现在的日本。

很显然，如今的日本与当时美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被滨田宏一和本田悦朗奉为圣经的经济学，其前提是“国民拥有强烈的欲望”。

如今的美国仍然是这种状态。只要利率稍微下降，国民就想着要买车、买房、买家电等。很多人职位一到课长、部长级别，即使自己已经有了房子，也还是会很自然地考虑在南方比较暖和的地方再买一套，以便退休后居住。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就是由一群有着旺盛欲望的人们构成的。所以，在美国，只要向市场投放大量资金，或者降低利率，经济就会马上好转。不可否认这一逻辑在美国是成立的。

想确认美国属于高欲望社会，去看一下美国的单身派对和单身酒吧就会了解。在美国，每到周末到处都是单身男女聚集的单身派对。城市里还有单身酒吧，这些地方都已成为单身男女约会的场所。当然日本也有这样的俱乐部和酒吧，比如位于东京港区的麻布和六本木等街区，不过这

些地方的目标消费人群多是年轻人。美国就不是这样，在美国，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能找到适合他们的聚会和酒吧。

我有一位美国朋友，虽然已经 60 多岁了，但每到周末他就西装革履地前往单身酒吧，自己坐在吧台喝酒，并和周围差不多岁数的女性搭讪“下周一起吃饭怎么样”，简直就是开启了第二次青春。看到这种情景，总觉得是特朗普这些人支持的。

美国人之所以过了 60 岁还能够开心地出入单身酒吧，是因为不论男女，他们都有着旺盛的欲望，都想着再好好享受一下人生。

然而，60 岁的日本人都在干什么呢？在公寓里狭窄的阳台上养着兰花，牵着比猫还小的狗在家附近散步，这些朴素的兴趣就能让日本国民非常满足。对于这样一群低欲望的人，很难想象他们会穿着好看的衣服，化着精致的妆容，兴冲冲地去单身酒吧。

不过，在日本，低欲望的不仅仅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是一样。如今的日本年轻人既不想买房买车，也不想结婚生子，从 30 岁开始就为老年生活做打算，不停地存钱。关于日本年轻人的低欲望这一问题我将在后文中详细阐述。

提到买房这一问题，日本有国民长期固定利率型的房屋贷款“Flat 35”，可以说是相当优惠的一项政策。然而，即使利率

低于 1%，想要贷款买房的日本国民也相当少。若是国外有这种优惠的房屋贷款类型，一定会有很多人贷款买房。

所以，现在的日本已经步入国民失去消费欲望的“低欲望社会”。国民的低欲望才是日本社会最大的特征，是日本经济低迷的元凶。因此，将美国那种高欲望社会的经济对策用在日本这种低欲望国家，一定不会有成效。

## 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无能为力 的日本经济

在 2016 年 7 月的参议院选举之前，安倍首相特意从美国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邀请至日本，想要让保罗·克鲁格曼来证明其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在我看来这一行为毫无意义。

虽然保罗·克鲁格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是他一直都在研究高欲望社会，而对日本这样的低欲望社会并没有深刻的了解。

事实上，保罗·克鲁格曼在提议实施“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的时候，在美国《纽约时报》（2015年10月12日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反思日本》的评论。文章中提到，“虽然日本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内需不高”。可以说，保罗·克鲁格曼的这篇评论是在宣布日本的“异次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失败告终。

想必保罗·克鲁格曼想说的是：“明明向市场大量投放了资金，为什么物价不上涨、消费也不增长呢？真是搞不懂日本的经济状况。”

##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属全球首例

安倍首相在参议院选举获胜后，就马上将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本·伯南克请到官邸，双方就经济金融政策进行了讨论。我认为这一行为同样毫无意义。

伯南克一直支持“直升机撒钱”<sup>①</sup>政策，他认为若能够扩大

---

① 直升机撒钱，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9年提出的，指政府或央行提供大量货币供应的政策，就好像有人拿着大把的钞票坐在直升机上撒钱一样。这是一种为财政赤字进行货币融资的方式，央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的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来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进而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资金，以此鼓励开支和借贷。——译者注

就业，完全可以考虑“直升机撒钱”，伯南克也因此被人们戏称为“直升机本”。不愧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说话都这么潇洒。不过在伯南克还是学者的时候，就因经常口出“狂言”而闻名，例如，之前他说过“只要削平落基山脉就能达到经济效果”这一言论。

要削平落基山脉，就得开始一项大工程，那么就会需要大量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削平落基山脉确实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果。但是他的这些想法是否能够刺激日本经济就另当别论了。

2016年的夏天，我开着摩托车在北海道跑了2000公里，所到之处都能看到“直升机撒钱”政策的“影子”。

从稚内到猿涧湖途中有一条靠海岸的路，我开着摩托车走了半天，沿途都没看到一个信号灯。因为几乎没有行人和车辆，所以不需要设置信号灯，但是道路却整修得干净整洁。这简直就是“直升机撒钱”政策的“功劳”。

然而，日本的地方经济却没有因为这些工程而好转。安倍首相若是真的接受伯南克的建议采

取“直升机撒钱”策略，应该也看到这样的结果。

若政府实施“直升机撒钱”，撒的钱是多余的钱还好，但是在日本实施“撒钱”，本金就全部得从下一代那里借。

然而，15年后或20年后的下一代日本国民，会心甘情愿地借出这些钱吗？无论什么年代，缴纳税款的一方永远都是在职一代。从日本的人口动态来看，今后在职一代的人口将不断减少。所以，未来的日本将面临即使下一代想借这笔钱也拿不出来的窘境。

这种将负债推给下一代的经济政策，作为政治家，从道德层面上讲也绝对不能这么做。所以从这一角度上讲，“直升机撒钱”政策也不是一项好的经济政策。

不仅仅是保罗·克鲁格曼和本·伯南克，恐怕全球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够痛快地给出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处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日本近年来已经步入“低欲望社会”，迄今为止，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发生过这种情况，日本是全球首例。虽然近年来意大利、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也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过日本是最早进入低欲望社会的国家，是“突出的先行案例”。

而最了解日本状况的肯定是日本的经济学家，所以日本的经济学家应该彻底调查分析日本的现状，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那才是真正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对于美国学者的说法，

只要引进、解读一下就好，没有必要完全照搬美国的做法。

## 日本的核心消费人群是“单身贵族”

安倍首相将经济当作最优先课题放在弓弦上，并相继放出几支箭，但日本的经济却丝毫没有好转。这是因为安倍经济学仍然在沿用 20 世纪的经济政策，想通过利率和货币发行量来调控经济，完全无视日本的现状。

若是日本的经济学家仔细调查并分析一下日本现在发生的现象，就会立刻明白，如今的日本经济问题是 20 世纪的经济政策解决不了的。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日本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对微观经济，也就是说对现在的消费者心理和实际情况的研究不足。

据日本 2016 年国情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一共有 5184 万户家庭，其中独自成家的户数有 1679 万，占比 32.4%，而夫妇与孩子共同组建家庭的户数是 1444 万，占比 27.9%，显然独自成家的家庭

已经占了大部分。以 2016 年为节点，日本一个人生活的家庭比例达到史上最高值。而且这是每一代人都会发生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不结婚、晚婚的人越来越多，还有离婚和另一半去世的家庭也在增加。

之前“适婚年龄”这个词经常听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和异性相处很麻烦，而且结婚又费钱，不用特意去办也无所谓。此外，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希望自己因为怀孕而中断职业生涯，这也是未婚、晚婚人群比例增加的一个原因。

据日本政府通过的 2015 年版《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日本国民平均首次结婚年龄，男性为 30.9 岁（比前年推迟了 0.1 岁），女性为 29.3 岁（比前年推迟了 0.1 岁），显然日本的晚婚趋势在逐年加剧。而 1980 年的日本国民平均首次结婚年龄，男性为 27.8 岁，女性为 25.2 岁。短短 30 年，日本国民平均初婚年龄，男性和女性分别推迟了 3.1 岁和 4.1 岁。

此外，最近在中老年人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那就是选择离婚独自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多女性认为，一直以来自己在家都像保姆一样任劳任怨，所以面对退休后没有工资的丈夫，她们会认真考虑后提出离婚。她们想着与丈夫分完存款、退休金、年金后赶紧离婚，然后再享受一次单身生



活。对于那些没走到离婚那一步的女性，她们最后也还是会独自生活的，因为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

如今，日本 NHK 的主播在播节目的时候还是习惯性地讲“电视机前的全国家庭们”。然而，事实上他们以为的那种以家庭为单位观看电视节目的方式早已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看电视。而且即使是一个大家庭，大家也不是都看同一个节目，每个人都随意看自己想看的节目。如今的电视节目已经不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看了。

说到这儿，最近好像连美食节目也不像以前那样教观众做四人份、五人份了，而是在做四人份料理的时候，将四人份改说成“四次量”。

越来越多的人独自成立家庭，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还体现在各种地方。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家庭餐馆。本来家庭餐馆是每到周末专供一家人轻松用餐的餐馆，可如今全家人一起用餐的情况显著减少，所以现在很多店铺也逐渐改为接待团体顾客。即使想呼吁大家庭前来用餐，也早已没有大家庭了，所以店铺为了生存不得不调整方向。

GMS（大型综合超市）冷清的原因也在于此。一般这种商店都是一些家里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开车前往，若是这些家庭不把汽车后备厢装满，这种百货商店就很难生存。

如今的日本，即使是一起生活的大家庭或夫妇，购物也都是单独出行，这种现象已经十分常见。

因此，如今日本的核心消费人群是“单身贵族”，但是以单身人群为目标消费者的市场却没有打开。例如，超市、餐厅或居酒屋，这些地方到现在还是以两人以上到店为前提来备餐、陈列店内桌椅和摆设等，因为这些地方都将消费者定位在亲子、夫妇、情侣或是朋友。因此，单身人士吃晚饭的时候，就会选择在便利店或是商场的地下菜市场买一份便当，然后回家边看电视边吃，或者在附近的牛肉饭小店或定食店，一边玩着手机，一边默默地往嘴里扒饭。单身人群的选择只有这几个地方，也真是寂寞。

不过最近倒是出现了一种专供单人用的卡拉OK。可见单身人群的消费市场还有很多有待开发的领域。

### “尽可能不负债”的心理让日本年轻人逐渐“草食化”

一系列措施都无法刺激到日本经济，其最大的原因在于日本国民没有消费的欲望。日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



用低，最近很多人连葬礼都在那里办。

第三个关键词是“LaLaporter”，是指那些生活完全围绕三井购物广场 LaLaport<sup>⊖</sup>展开的人们。“LaLaporter”自认为比“永旺人”更高级，所以会有一种优越感。而事实上，他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都在一个地方就完成了，在这一点上他们两者并没有大的差别。日本时尚周刊 *WWD JAPAN* 在 2014 年 5 月 19 日发行的“SC 新时代”特刊上详细介绍了这两类人，引起了国民的广泛讨论。

我们那个时代，正如小田实的游记《什么都去看一看》（讲谈社，1961 年出版）中记述的那样，年轻人背着一个旅行包游历世界、开阔眼界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当时，在日本的北海道一带还有很多年轻人经常背着像蟹壳形状的登山包到各处游历，因而被称为“螃蟹一族”。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全然没有那种精神了。

此外，在那个年代，像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等这些勇敢走向世界并取得成功的经营者，是所有人都崇拜的成功者。

现在的日本，像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等成功人士都应该是年轻人崇拜的对象，然而日本

---

⊖ LaLaport 是日本规模最大的购物中心。——译者注

的年轻人好像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这些成功人士都是异类，与自己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日本年轻人从一开始就画好一条线将自己与这些成功人士分隔开来，“不越雷池一步”。可以看出，几十年间日本年轻人的基因完全变了。

我经常与那些二三十岁的商务人士聊天，发现他们大部分都觉得自己不需要车，也不想买房，不想结婚。我认为这些想法的背后是一种“尽可能不负债”的心理。

我们年轻的时候比现在的年轻一代要穷得多。我记得在结婚时，我的工资还不到6万日元，即便那样，我们也没有因为没钱而选择不结婚。我记得在盖房子时，住房贷款的利率超过了5%，所以还完全部贷款后，算下来利息比本金还要多得多。即便如此，那个年代的我们觉得能够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主人是很高兴的事情，即使上班需要一个多小时也不嫌麻烦。在那个年代，可以说负债并不是亏损，反而是努力生存下去的动力。

未来是不确定的，这一点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改变。但是，我们那代人即使贷款借钱也要买车买房，而现在的年轻人不会为了买车买房负债，认为努力攒钱才是明智的选择。

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永旺或 LaLaport 这样的购物商场以及周边狭窄的生活圈就能满足他们。他们成年后也不离开故乡，既不买房买车，也不结婚。一群欲望如此衰退的人们，纵观全球也就只有日本才有了。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首次出现这种状况。国民对汇率变动、货币供应量没有任何反应，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

### 30 岁就开始存钱是因为对老年生活感到不安

那么为什么年轻人不积极地消费呢？显然是因为他们对未来和自己的老年生活感到不安。换言之，就是完全不信任日本政府。若是日本政府能够让他们足够信任，他们自然就会想着充实自己的生活，然后去消费。

瑞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瑞典国民根本不必担心自己年老后会被国家视为麻烦，所以大家都不存钱，也不买保险，赚来的钱全都毫无顾虑地用来享受生活。意大利的国民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老年生活，所以想着要在去世前把钱

花光，干脆就经常休假旅游。

然而，日本国民从 30 岁左右就开始存钱，即使存款已经足够买车买房，也还是要将一部分钱用于储蓄，以备自己老年生活。我还真没听说过有哪个国家的国民从 30 岁就开始担心老年生活并积极存钱，而现在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国家。

然而，安倍首相在参加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举行的集会时，提出让企业给员工加薪，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对于现在的日本，即使企业勉强给员工加薪，由于国民普遍对老年生活和未来感到不安，他们只会把那部分钱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日本经济是不会因此而好转的。显然安倍首相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

本来日本的经济学家应该大胆提出，即使企业给员工加薪，日本 GDP 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增长。但是我们完全听不到这样的声音，这是因为整个日本都没有谦虚地直视日本的现状。

日本劳动者的工资不涨，是因为在工资水平低的中国和越南，当地的劳动者做着和日本劳动

者同样的劳动。然而，日本政府对“同工同酬”没有明确定义，却将这一定义不明确的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可以说，在中国从事同样劳动的人们阻碍了日本劳动力的工资上涨。在无边界经济时代，想要只提高日本国内工资水平来刺激经济，这种想法本来就不正确。

20 世纪 80 年代日元大幅度升值，当时许多日本企业纷纷将工厂迁至海外，或者提高生产率或是进行改革创新，并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措施，最终渡过难关。而日本现在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连日本企业一直以来遵循的道路方向都不知道。

## “失去的 25 年”间，日本国民的个人金融资产增加了 700 万亿日元

在日本，不花钱的不仅是在职一代，还有老年人。日本的老年人明明有钱，却一直攥在手里不愿消费。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已经超过 25 年了。一般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国民为了维持基本生活是会取出存款用于消费，所以这 25 年来日本国民的个人金融资产应该是减少的。然而在这 25 年间，日本国民的个人金融资产从 1000 万亿日元（1990 年年末）增至 1700 万亿日元，足足增加了 700 万亿日元。这正是因为老



年人一直存钱导致的。

最近的日本电视节目、报纸和杂志经常报道一些贫困“底层老人”的情况，所以有很多日本国民认为老年人基本上都很贫困。这都是那些过度渲染“老年贫困”的媒体惹的祸。

事实上，日本老年人中真正不能生活的贫困老人比例只有不到 1%。而我们会觉得贫困老人数量不断上升，主要是因为老年人这一群体的基数变大了。当然，并不是说贫困老人的比例不到 1% 就放任不管了，相反，国家应该马上对这部分老年人进行生活救助。

我们在探讨老年人经济状况时必须要考虑平均值。若是将位于正态分布曲线一端的群体当作这代人中的主要群体来分析问题的话，就会看错事情的本质。

## 日本老年人每人将抱着 3500 万日元离世

那么，日本老年人的平均经济状况如何呢？我在调查这一问题时有意外的发现。

据一家银行的负责人称，在他们银行的年金账户中，完全没有动用过年金的账户占三成多。而且据统计，将年金取出来的人也绝不会把所有的钱都用于消费，平均有三成会再储蓄起来的。

也就是说，在日本老年人当中，有一部分属于贫困老年人，但很明显还有一部分老年人持有许多年金，而且据统计后者占绝大多数。媒体与其过度渲染少数“底层老人”的惨状，不如把焦点放在这一事实上。

此外，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日本老年人在去世时是个有钱人”这一事实。日本的老年人普遍将每月汇入年金账户里的三成资金用来储蓄，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几乎不花钱。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等到临终时，日本的老年人平均每人拥有 3500 万日元的金融资产。

为了安享晚年而努力存钱，但等到老了以后又不花钱，存款不仅全都剩下了，还多了不少，然而人却去世了。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我的一位外国友人曾对我说：“忍着自己想做的事情，一辈子省吃俭用，到最后能不留遗憾地离开人世吗？日本人的老年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他们表示难以理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我真是深有同感。

与如此节约的日本老年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意大利老年人。

与日本一样，意大利的经济也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是意大利的老年人却在充分地享受老年生活。

地道的意大利人要在临终前把所有的钱都花光。自己赚的钱、自己存的钱就要自己花光，不留给后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钱就是为了安享晚年而存的，所以年老的时候不把钱花光还等什么呢。我认为这才是幸福的人生。

### 所谓的“以防万一”……

为什么日本的老年人不积极地消费，而且直到临终前还在不停地存钱呢？要问其理由，一般都会听到这样的回答：“仅凭年金和存款就能安享晚年了吗？大家都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感到不安，所以还是不能花钱。”

之所以日本的老年人每天过着拮据的日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年人不了解自己当下的资产，对步入老年后能够得到的资产以及保险的作用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每当听到年金危机，或是步入老年后如果资产不到1亿日元就不够养老

等这样的报道，老年人对未来的不安感就会加重。

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在第 3 章中会有详细阐述。例如，做一个资产负债表确认自己的资产情况，制订步入老年后的生活计划。这样一来，大部分老年人就不会毫无根据地对未来感到不安了，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人会想，“要想在 85 岁之前花光剩下的资产，那么接下来的每一年都要比之前多花 100 多万日元”。

此外，日本老年人不花钱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存钱“以防万一”。对于那些正值工作年龄的在职一代来说，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万一”发生。但对于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所谓的“万一”是什么呢？想来也只有“预料之外的长寿”或是“生病”这两种情况。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 年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为 80.79 岁，女性为 87.05 岁。但这终究是统计的数据，自己能活到多少岁还是要等到真正活到那个岁数才知道。日本老年人考虑到万一自己能活到 90 岁、100 岁还是需要钱的，因此他们会觉得最好不要动用存款。对于老年人的这种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只要自己还活着就能一直领取年金，若是比自己预料的还要长寿的话，用完存款还可以靠年金生活。

## 在永旺办一场最豪华的葬礼也不过 70 万日元

由于年轻一代指望不上年金，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老年生活储蓄也不是不能理解。因为我也不相信日本政府宣称的，现在的年金制度能够让国民 100 年都不用担心。

刚进入 21 世纪时，我曾在某电视节目中与一位担任政府年金制度改革顾问的日本国立大学教授讨论过这一问题。据这位教授说，新的年金制度是要实现每年 4% 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工薪阶层的定期加薪也实现 4% 的目标，此外还要确保出生率恢复到 2 以及实现 5% 的投资收益率等。

然而，当时的日本还没有走出泡沫经济破裂的低迷期，在这个节点上想实现 4% 的经济增长和定期加薪的目标，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此外，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不断加剧，出生率恢复到 2 也是空想。

针对新的年金制度，我认真追问这位教授，但他只是一直回答，“以这些目标为前提的话是没

有问题的”，并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根据。

这已经是 16 年前的事了。那位教授所谓的这些前提是多么荒唐已无须赘言。也就是说，现在的年金制度是建立在那位教授的那些虚幻前提上的。所以可以想象，如今的年金制度有多少漏洞。

但是，对于现在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显然，他们是“年金制胜的一代”，其中大部分人都持有大量年金。

确实老年人若是得了大病，只有年金是不够的，但一般情况下都会有保险。事实上，在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每五个人里只有一个人是需要看护的，比例只占 20%。然而，知道这一实情的老年人又有多少呢？因为媒体只报道个别的极端事例，所以老年人想着万一自己也到了需要看护的时候，存款就变得十分必要了。这种想法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从客观的统计数据来看，老年人是无须过多担心这一问题的。

若是过了 90 岁后得病，那就是自己的天寿已到，坦然接受并在去世前再好好地享受一次人生，我认为这才是老年人该有的思想。然而，大部分的日本老年人都不会这么想。

就这样，日本人一边念着咒语般的“以防万一”，一边继续存钱。相对于去世前花光所有积蓄的意大利人，日本人在去世

时却还有 3500 万日元的积蓄，可以说是其一生中最大的资产。

日本的老年人经常说，若没有存款的话，到时候连自己的葬礼钱都拿不出来。但是据我所知，永旺最豪华的葬礼，费用也不过 70 万日元，那么抱着 3500 万日元存款的老年人是想要办多么豪华的葬礼呢？

## 日本老年人不像意大利人那样积极消费 是源于日本的战后教育

即使葬礼无须花费很多钱，日本老年人仍然不会将年金全部用于消费，而是将其中的三成用于储蓄。这是因为他们没分清年金和工资的差别。

对于日本的老年人，他们什么也不用做，国家每两个月就会将固定的金额汇入他们的账户，明明什么都不用担心，而且即便是为了享受生活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无大碍，但是这些老年人却为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的“万一”而辛苦存钱。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习惯。

对于这代老年人来说，储蓄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他们已经不能正常判断和思考问题了。但这并非是他们个人的原因，实际上现在的日本老年人被战后教育洗脑了。

“二战”后，日本受到联合国的严厉制裁。而且，日本国土面积本来就狭小，资源匮乏，所以要想实现战后复兴，让近一亿的国民都吃上饭，日本只能选择加工贸易这条路，即从外国进口原材料，然后在国内进行加工再出口到国外，依靠产品附加值盈利。

面对这条唯一的出路，战后的日本政府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种思想通过学校教育灌输给国民。这样一来，劳动者就会从早到晚汗流浹背地辛勤工作，产量也就大大提高了。

这一尝试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功，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整个日本都沉浸在喜悦中。所以，在日美发生贸易摩擦时，即使美国指责日本，认为“日本国民普遍超负荷工作”，日本国民也充耳不闻。

总之，在当时的日本国民眼里，“勤恳是人间至善”。他们认为，在公司里废寝忘食地工作，只会被称赞为“工作狂”，没有人会指责这一“优秀品质”，而那些不努力工作的美国人没有资格评论。这是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日本国民的真实想法。

此外，作为一个战败国，想重振本国企业就需要大量的资



金，银行要想提供低利率贷款给有潜力的企业，就必须集结整个国家的资金。因此，当时的日本政府大力号召国民“为了美好的将来而储蓄”。

与日本政府一样，意大利政府也鼓励国民储蓄，但是意大利国民好像不怎么听话，所以并没有什么效果。然而，日本国民却相当听话，他们纷纷将 15% ~ 20% 的收入存入银行或邮局，简直就像全民运动一样。在家庭里，就连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时都要嘱咐一声，“不要全部花光，要为将来存点钱”，这已经成了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时期的常识。

就这样，他们那一代人从懂事起就不停地被家庭和学校教育“要勤勉，不要做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事，要努力存钱”，如今他们步入老年了，日本 1700 万亿日元个人金融资产的大部分都是他们持有的。他们紧紧攥着一大笔钱而不消费，这都是日本战后教育的结果。俗话说“三岁看老”，他们这一代人的储蓄习惯是很难改变了。

在“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咬紧牙关艰苦生活，从来没被教

育过要好好享受人生。对于这样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到了花甲之年，即使有人劝他们“从今往后也要像意大利人那样好好享受人生”，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享受。

## 老年人储蓄是牵制子女的一种方式吗

事实上，日本老年人不停存钱的理由还有一个。

前文已提到日本老年人平均每人将抱着 3500 万日元的存款离世。那么他们是想在离世后把这些钱留给谁呢？中国的老年人肯定会毫无疑问地说，“留给儿孙们”。30 年前的日本也是如此，当时的老年人将钱分给长子和长女是很普遍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日本已经变了。要是去问一些还算有钱的老年人打算把钱留给谁，他们大多数都会说“还没决定”。

为什么还没决定呢？难道不是留给子女的吗？虽然这一回答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若是了解这句话背后的深层考虑的话，多少都会有一些复杂的心情，也会理解老年人了。

老年人希望子女能够照顾自己到临终，但是子女们总是会先顾自己，根本不会好好尽孝，老年人认为他们可能连看护都不会好好做。但若老年人自己手里有钱，子女们知道等到父母离世后这些钱肯定会留给自己，多少还是会照顾一下父母的。

这就是日本老年人不停储蓄的另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老年人直到弥留之际还紧紧攥在手里的 3500 万日元，已经成为一种用来让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的“牵制力”。

可以说这是日本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国民进入老年后，一旦行动不便就会去专门的老年人医院或养老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例如，在瑞典，为了不给予子女添麻烦、让子女幸福生活，上了一定岁数的老年人会主动住进养老院。整个社会也都认同这种行为，国家也用心建设老年人的“最后归宿”。老年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要让子女赡养的想法，所以他们才会毫无顾虑地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

## 父母对老年生活的不安感夺走了 子女的“志向”

现在的日本国民中仍然有不少人认为照顾年迈的父母不是国家的责任，而是子女的责任。

日本的父母们对子女的职业考虑往往带有自

己的私心，他们希望女孩从事护士行业，男孩成为公务员。若女儿是护士，那么照顾自己就会很方便；若儿子是公务员，每天都会定点回家，也不用担心经济不景气时失业，而且退休后也能拿到稳定的年金，既有时间也有钱，这样就能好好地赡养父母了。

父母们看起来是为了子女考虑，但事实上只是考虑了自己的老年生活，将子女当作老年生活里最后的依赖。真是可悲！

被这样的父母养大的孩子，他们会认为平平淡淡过一生就好了，所以不要指望这些孩子能够突然有一天变成拥有远大抱负的有志青年。

国外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例如，在犹太人家庭中，在子女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会教育他们要有投资的概念，教子女投资理财的方法。美国人也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像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那样，年轻的时候不断尝试和挑战，自己创业，积极地赚钱。日本大部分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公务员，而美国的父母认为自己的女儿与公务员结婚并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甚至大多数的父母都会很反对，他们会劝自己的女儿，“另一半竟然是无聊的公务员，还是重新考虑一下吧”。

日本的子女们一直以来都被父母教育，“好好听老师的话，

要拼命学，要进入好的学校，要在稳定的企业或政府机关工作，要过上安定的人生”。事实上日本的子女们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做的。所以，一直以来他们都过着安定的生活，也有着不错的收入，于是也同样要求自己的子女这样生活，认为这条路并没有什么错。

确实，对于现在已经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若是能在大企业稳定地工作，工资每年都会上涨，奖金也能足额发放，到了一定年龄，不管能力如何，都会当上课长、部长。因为在那个年代，日本的经济本身就在增长，企业的营业额也在逐年上升。

但是现在的日本不一样了，即使你成绩优秀、就职大企业，也不能保证一定能过上安定的人生。东芝、夏普等这些日本老牌大企业的现状，如实地反映了如今的日本经济情况。

如今的日本是全球负债第一国。政府每年通过的预算都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而财政收入又不足，所以每年都要发行 30 万亿~ 40 万亿日元

的国债，如今日本的国家债务已远远超过 1300 万亿日元。

2016 年年底，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 2017 年度预算案，年度预算总额达 97.45 万亿日元，连续第五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税收方面，2017 年度税收预计只比 2016 年度增加 1080 亿日元，为 57.71 万亿日元，基础财政收支的赤字规模相较于上一年再次扩大。

不久的将来，即使公务员也不再是“铁饭碗”了，日本很可能也像希腊那样，一半的公务员都将被改组。

只有那些不断开拓新领域、靠自己寻求真理的“冒险家”，才能在这个时代生存下来。21 世纪，没有什么工作是能一辈子稳定的，谁也保证不了我们的未来。

把赡养老年人的责任交给子女，不仅束缚了老年人自在地花钱，同时也扼杀了子女们的其他可能性。若是国家不去消除老年人对老年生活的不安全感，不切断这种畸形联系的话，下一代人还会重复同样的事情。这种联系就像复合污染一样，会导致日本国力急速衰退。

## 消除老年人对老年生活和未来的不安才是 刺激经济的最佳政策

综上所述，日本老年人不花钱是由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导

致的，但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老年人对老年生活和未来感到不安。年轻人的心理也是一样的。无论如何也不动存款，连年金都存起来，一方面是因为这代老年人被战后的教育洗脑，认为“储蓄是人间至善”，但更大的原因在于老年人认为，“只有把钱留到自己的弥留之际才会安心”。

那么，让我们倒过来分析这个问题，事情就容易多了。

若是政府能够消除国民对老年生活的不安感，那么市场就会有资金流入。特别是日本的老年人，因为整个日本 1700 万亿日元个人金融资产中的一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只要他们拿出那些为了“以防万一”而存起来的存款去充实自己的人生，肯定会有很好的经济效果。

前文中已说过，即使拿出个人金融资产的 1%，那也有 17 万亿日元，这已经超过 GDP 的 3%。只要将这些钱用于消费，日本的经济就会立刻好转，走出持续低迷的状态。

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方法，并不是给劳动者加薪，而是让老年人花钱去充分享受人生，进而

刺激日本经济。因此，安倍首相建议经济团体联合会给日本劳动者加薪的这一行为毫无意义。

这些现象在 20 世纪的教科书里没有，但这才是 21 世纪的日本最真实的样子。

利率越下降，对国民的冲击越大。安倍首相、黑田行长“撒钱”与否都没什么影响，因为国民手里有钱。不研究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而请外国的经济学家来询问意见，这简直就是糊涂透顶的事情，安倍首相也应该适可而止了。

若是国民对自己老年生活感到不安，即使政府下调利率、加薪，国民也依然不愿花钱。安倍首相若真想重振日本经济，实现 600 万亿日元的 GDP 目标，就应该集中力量去推动老年人消费。

政府具体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请看第 2 章。